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和多元社会思潮激荡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场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高校思政课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外，还有传承民族精神血脉、塑造学生精神家园的历史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给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政课思想活水和文化滋养。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壁垒的客观存在和教学惯性的影响，思政课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逻辑演绎、轻文化底蕴浸润的现象，使学生在理论学习灌输时缺乏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不能真正实现理论知识的内化于心。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或者形式上的拼凑，而是一场教学理念更新、内容体系重构、方法手段变革的深度化学反应。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冲破工具理性束缚，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育人目标上的一致性，明晰二者在育人方向上的同向同行。探究该融合过程中的关键着力点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政课程体系，提高思政教育的时代感与感召力，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紧迫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堂教学体系优化

挖掘传统文化育人资源同教材内容契合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堂，首先要精准挖掘它和统编教材内容的深层次契合点，实现从文本体系到教学体系的有机转化。这需要教师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能穿透历史的表象，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基因密码。以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讲授为例，可以深入联系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通过分析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以及本土适应性。在涉及爱国主义教育章节中，应该对历代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进行系统的梳理，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同现代公民的国家认同进行逻辑上的联系。关键之处在于建立一种同构性的叙事逻辑，也就是不脱离教材主线，把传统文化当作阐释理论、丰富案例、升华情感的优质素材。借助这样一种学理上的深度对接，传统文化就不会在课堂上被片面地、零散地表达出来，它不会成为思政理论大厦中生硬的修补，而会变成支撑起思政理论大厦的坚实基础，从而在逻辑论证和情感渗透两个方面提高教材内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数字化技术赋能下沉浸式文化思政课堂打造。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数字化赋能成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重要变量，也给思政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赋予了新的途径。打造沉浸式文化思政课堂，就是通过虚拟现实、全息投影、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打破传统课堂时空的局限，重新建构学生认知体验的场域。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把抽象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可感、可视、可交互的立体图景，复原历史重大事件的现场氛围，让学生漫游于虚拟的文化遗产空间。那种具身认知的教学方式可以大大降低学生对深奥理论的认知负担，使学生在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技术可以创造一种情感共鸣的介质，用声光电综合运用来渲染课堂氛围，使思政教育由枯燥的说教变成直击人心的精神洗礼。沉浸式体验不只是感官上的刺激，更是在情境代入下引起学生深层次的思考，使学生在虚拟和现实的交互中，主动地完成对传统文

化价值的认同和接纳，从而大幅度提高思政课堂的抬头率和点头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育人支撑机制建设

基于文化场馆资源之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拓展。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程度，而社会文化场馆作为物质化的文化记忆载体，是拓展思政实践教学不可缺少的支撑平台。创建以文化场馆为依托的实践教学基地，就是打破高校围墙的物理隔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地联系起来。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等场所中蕴藏着丰富的隐性教育资源，其所营造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神圣感是常规教室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建立常态化的馆校合作机制，组织学生开展现场教学、志愿讲解、专题调研等活动，使学生在触摸历史、感知文脉的过程中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变成鲜活的感性认识。这样的场景转换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主体性参与的意识，使学生在行走中感悟、在体验中内化。不仅如此，利用文化场馆开展实践教学，还可以使学生关注地域文化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基于实物实景的沉浸式实践，构成了思政育人的第二课堂，有力地支撑了传统文化从认知层面相关联到信仰层面相融合的跃升。

胜任力导向下思政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提升。教师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关键主体，教师自身文化素养和转化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融合的深浅、宽窄。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师素养提升，要求思政教师不能只是政治理论的传声筒，更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者、传播者。这就需要创建起一套系统的教师培养和评价体系，促进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提升。教师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关键主体，教师自身文化素养和转化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融合的深浅、宽窄。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师素养提升，要求思政教师不能只是政治理论的传声筒，更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者、传播者。这就需要创建起一套系统的教师培养和评价体系，促

进价值共创设计，建立群众参与制度化渠道，在政策制定、流程优化等环节吸纳意见，采用“政务随手拍”模式，形成“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的格局。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服务改革，围绕企业开办、新生儿出生等高频率事项推进跨部门集成办理。创新多元服务渠道，整合政务大厅、手机APP等线上线下多种资源，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推动服务向社区基层延伸。

技术赋能：打造智慧包容体系
提升数字化精准度，运用大数据分析群众办事特征，实现服务精准推送；推进“免申即享”，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群众，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增强技术包容性，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优化平台

使教师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也要广泛地涉猎文史哲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教师应当有跨学科的视野，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教育智慧，用古圣先贤的育人理念来改进教学方法，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另外，提高胜任力还表现在教师话语转化能力上，即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把深奥的传统文化精髓同现代思政理论联系起来，实现古今对话。通过开展专题培训、经典诵读、文化考察等活动来涵养教师的儒雅气质和君子人格，使教师在言传身教中起到榜样的示范作用。只有教师自身成为传统文化的践行者，才能在课堂上表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魅力，从而打动学生、感染学生。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项系统性、长期性的铸魂工程，牵涉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质量落实。本文认为，融合的过程要体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找到教学体系优化和支撑机制建设的着力点。课堂教学层面以教材契合点为依托，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沉浸式传播，支撑机制层面拓展实践基地、提高教师素养，给文化育人提供场所保障和师资支持。这些着力点互相支撑、互相补充，一起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育人格局。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要继续探索文化与思政融合的新范式，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引导广大学生在传承中华文脉中坚定理想信念，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北港湾大学；本文系教育部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JDSZK087）

坚持人民至上，引领政务服务改革创新

政务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时代以来，我国政务服务以“放管服”为核心，实现了从线下集中办理到线上“一网通办”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进阶式发展。数字化、一体化、高效率成为政务服务的鲜明特征。但是，当前我国政务服务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数字鸿沟的出现、部门协同不足等矛盾凸显。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对政务服务的需要来引领新时代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民至上在政务服务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1.价值维度。以满足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到群众需求的转向；2.主体维度。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赋予其表达诉求的权利，畅通表达渠道，参与服务供给和评价，构建政民协同治理的新格局；3.实践维度。政务服务聚焦群

众的“急、难、愁、盼”，推进服务内容和形式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人民至上引领政务服务，同时体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静态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新时代以来，我国政务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数字赋能成效突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深层困境。例如，部分地区“重效率轻公平”“重技术轻服务”，过度追求网办率等量化指标，而忽视了老年人、低学历人群及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供需匹配精准度不足，部分线上平台操作复杂，数字鸿沟明显加大等问题较为严重。协同机制不健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壁垒没有完全打破等现象普遍存在。

坚持人民至上，引领政务服务改革创新的具体实践路径如下：
价值重构：锚定群众需求导向
构建需求导向体系是政务服务改革创新的关键所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或实地走访、调查问卷等常态化调研机制，精准识别群众的急、难、愁、盼之事，不断动态调整政务服务

李嘉祺

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革命性超越

在人类思想史上，世界历史思想的建构主要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代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黑格尔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统一归于“理性”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性与必然性。但根本缺陷在于其始终停留在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将现实的历史运动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实现，最终陷入为现状辩护的理论困境。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性扬弃，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革命。深入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谱系，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动因。

两种“世界历史”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世界历史”是具有解释性的思辨范畴，其核心在于为现存的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证明。

（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
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认定为是“理性”或是“绝对精神”的现实呈现。其核心运行机制为“理性的设计”，即通过驱动人类个体的特定激情及对利益的追求，在历史表象背后实现其普遍目的。其核心在于消解个体私欲与历史进程间的对立，使历史现象最终归于理性的架构中，从而在哲学层面论证现存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其理论最终导向是在其所处时代的国家形态中认知到自身的自由时，世界历史便在哲学层面达成了完成状态。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属于对现实秩序进行辩护的思辨体系，并未真正触及改变现实的历史实践。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将其从抽象的精神运动拉回到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中。马克思将历史主体重新确立为从事现实实践活动的人类，并将驱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锚定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他指出，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不断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进程。其思想不止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揭示，更蕴含

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它指明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性的革命阶级，肩负着打破资产阶级统治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的内在矛盾，也指明了通过实践变革实现社会形态跃迁的现实路径，彰显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困境
黑格尔世界历史凭借其强大的解释力，致力于将整个人类历史纳入合乎理性的逻辑中。正是这种将“解释世界”视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取向，使其无法真正介入现实历史的变革进程。这些困境不仅揭示了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局限，也证明了马克思转向“改变世界”的范式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

（一）其历史观的“目的论”色彩消解了历史开放性

黑格尔将历史的终点预设为由自由意识的实现，整个进程不过是为这一终局所作的铺垫，这种预设使历史成为精神自我展开的必然路径，从而否定了历史进程中真正的偶然性与人

（二）其历史观的“先验性、等级化”否定了哲学参与塑造未来能力。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承载“世界精神”的民族依次登场，历史呈现出从东方到西方不可逆转的线性演进图景。他把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强行纳入一个先验的、等级化的框架之中，其独特的价值与发展逻辑因其不符合“理性”的特定阶段而被忽视或否定。黑格尔曾言，“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思想，需待现实完成其形成进程并达成自身之后，方才出现。”这意味着哲学只能在历史终结处对其进行回溯性理解，而无法介入现实变革的进程。哲学因而沦为历史

完成后的旁观者，无法在现实尚未成形时发挥塑造作用。

马克思将哲学重心从思辨转向实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明确了马克思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体系之间的本质界限，标志着哲学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的范式转换。（一）从“绝对精神”转向“现实的人”
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开端是“理性”，人仅仅是“理性”实现其自身目的的工具和载体，其历史思想虽然蕴含丰富的辩证能动性，但在本质上仍是精神自我展开的抽象演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则被消解于思辨的逻辑中。

而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的起点与基础，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不再专注于为过往提供一

（二）从“理性的设计”转向“物质生产及其内在矛盾”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将历史动力归结为“理性的设计”，将历史的演进视为理性借助人的激情与欲望实现自身目的的隐秘谋划，历史的真正动力则被隐藏于个体意识之外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

但马克思指出，生产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两者之间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上出现的冲突其根源皆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且这一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最终成为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

成，也并非如黑格尔所主张的源于“自由精神”的普遍化冲动，而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发展至必须突破民族与地域界限的阶段，促使资本不断向外扩张，开创了世界市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借助对内在矛盾的深度剖析，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探寻新世界，为自觉地“改变世界”明确切实的切入点与方向。

（三）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黑格尔将其所处的日耳曼世界认定为世界历史的“终结”，认为理性国家实现了自由的最终形态，此观点不仅在哲学层面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亦在政治层面为既有现状提供了理论辩护。

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这一世界历史形态的内在对抗性和暂时性。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在实现普遍联系的同时，也生产着普遍的压迫和剥削，它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制造着极端的贫困和异化。这种内在的对抗性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点，而只是人类解放历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只有当人们在物质生产中真正掌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能突破异化劳动的桎梏，才能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解放的实现不依赖于观念的自我演进，而植根于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当劳动成为生产活动的真正主体，劳动产品不再作为异己力量同人相对立时，人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身的本质力量。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意识形态不过是这一现实过程观念反映。马克思由此将哲学的重心从思辨转向实践，强调哲学的使命不是解释现存世界，而是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批判性超越，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范式革命。这一超越不仅在思想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深刻洞见至今是我们科学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在当代全球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马克思这一思想愈发彰显其现实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进入数字时代，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与社交活动均离不开网络空间的支撑，互联网也已经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更新以及多元价值观的交叉融合，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在数字时代下面临众多挑战，如传播弱化、话语滞后、管理复杂度提升等。因此，如何有效提升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引导力、渗透力与影响力，是当下高校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更新网络育人理念，构建协同共育格局

现阶段已经步入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也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努力突破传统线下思政教育的局限性，促进理念、体系与机制的有机融合。首先，高校应当重视凸显网络思政政治教育在“大思政课”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将其纳入学校教育改革规划与“双一流”建设框架中，制定网络育人战略导向制度。其次，高校要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育人，以思政教师为核心、辅导员为辅助、学院党组织为枢纽、技术团队为保障的立体化育人主体队伍。提供组织保障，如，完善网络舆情联席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舆情研判、内容发布、风险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提供人才支持，积极提升培训、实践活动、激励机制提升教师和指导员的网络思政教育能力、数据研判能力与新媒体运营能力。

提升网络思政教育内容供给质量

高校网络思政内容普遍存在“内容空泛、形式陈旧、表达生硬”的问题，无法持续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自主参与积极性。为了突破这一困境，高校需要积极构建高质量的、多层次的、可持续的内容体系。首先，确保发布内容专业化，可以鼓励思政教师、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内容的策划与发布，精准提升网络选题的政治站位，增强语言表达的生动性，还要呈现一定的技术水准。其次，创新内容表达方式。在确保价值正确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利用校园微电影、短剧、动画、互动问答、直播访谈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再次，重视内容的贴近性。发布的思政教育内容需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以及学习需求，如，可以选择“学业压力、就业迷茫、情绪困扰、人际关系、公共安全”等热点议题，并用学生化的语言回应学生的疑问，展现出网络思政的温度关怀。最后，建立内容评估与反馈机制。积极发挥大数据分析优势，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情做出了解，如阅读偏好、互动方式与情绪倾向，在此基础上调整发布的内容，实现从“推送内容”到“精准供给”的转变。

优化网络平台与技术支撑体系

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持，因此，构建标准统一、功能整合、安全可靠的网络育人平台体系至关重要。高校管理者要从资源整合上出发，将学校现有的各类官方账号、知识资源平台、学生服务系统进行融合，构建集“思政教育、咨询服务、心理支持、舆情监测、资源共享、互动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网络思政平台。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育人的精准度。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情绪识别技术，动态监测学生群体的关注热点、网络情绪变化和风险点分布，并汇总数据变化特点，及时预判舆情趋势，并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增强网络育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高校管理者还要重视技术保障，积极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内容过滤机制、账号权限管理机制，确保内容安全、发布到反馈的全过程都处于数字监管之下。除此之外，重视平台运营能力的提升，积极鼓励辅导员、思政教师熟练运用平台功能，保持平台的活跃度，真正让技术成为网络思政教育实施的支撑。

健全网络行为规范教育机制

在网络文化多元、舆情快速扩散的背景下，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对虚假信息缺少辨识、网络行为规范意识淡薄、情绪化表达频繁等问题，这些问题为高校网络环境的治理带来众多挑战。因此，高校管理者要从提升数字素养、强化法治意识、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季、网络构建系统化的网络行为规范教育体系。首先，积极将数字素养纳入课程改革中，积极开设“网络素养基础”“媒介伦理与法律”等必修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让学生持续具备科学使用互联网的技能与意识。其次，教师创新教学模式，运用案例教学法，带领学生深入剖析网络谣言传播、隐私泄露事件、网络暴力等案例，增强学生对网络风险的警觉性与判断力，使学生能够理解网络行为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影响。再次，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场域。高校要定期开展各类网络文明主题活动，如网络文明大讲堂、清明校园网络文化季、网络公益创作大赛等，引导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践行各类文明规范。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网络思政活动，可以通过社团活动、网络文明志愿服务、学生网络监督委员会等形式，让学生在参与中锻炼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真正成为网络文明的建设者与维护者。

综上所述，面对传播格局日益复杂、社会文化不断变化、网络生态持续复杂的背景，高校应积极更新网络思政教育理念、创新网络思政内容供给、完善技术平台支撑、强化学生素养教育，努力构建全员参与、全过程覆盖、全方位协同的网络育人体系。只有提升网络思政教育的科学性、时代性和亲和力，才能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掌握育人主动权，抢占育人新高地，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立项课题：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相融合的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G25DB393的研究成果）

高校网络思政政治教育困境及路径探究

杨振权 盛林